

□刘永加

医药问题和医德医风古来有之。唐代官员、散文家、诗人柳宗元就曾以求医问药的亲身经历与体验感受,写下自己的批评和表扬意见,给今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医药史料。

在唐长安的日常生活中,生老病死一样是常态,那时生病了也要求医问药,长安街头开药铺行医的店家也不少,但是良莠不齐,有时令人真假难辨,难免上当受骗。

柳宗元在长安做官时,就有过这样的经历:有一次他突然患病,腹部胀闷不舒、心慌。医生诊断后开了茯苓,让他回家买药煮汤服下。柳宗元在一家药店买了药,回家煎煮后服下,谁知病情不但没有减轻,反而加重了。柳宗元让人把医生喊来,讲明他服药不但无效,反而病情加重的情况,问其原因。医生看了药渣后说:“您煮的是芋头,不是中药茯苓,一定是卖药的人为了赚钱用假的来欺骗您。”

柳宗元这个气呀!一般人也就自认倒霉,顶多找到卖药人讨个说法。但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想到不能再让更多的人上当受骗,于是撰写了一篇《辨茯苓文并序》,文中写明茯苓的功效,以帮助百姓辨别茯苓真伪,并把自己上当受骗的经历如实写出来公之于众,以此警醒大家。

柳宗元在这篇文章的序中写道:“余病痞且悸,谒医视之,曰:‘唯伏神为宜。’明日,买诸市,烹而饵之,病加甚。召医而尤其故,医求观其滓,曰:‘吁!尽老芋也,彼鬻药者欺子而获售……推是类也以往,则世之以芋自售而病入者众矣,又谁辨焉!’接着他在正文中写道:‘今无以追兮,后慎观之。物固多伪兮,知者盍寡。考之不良兮,求福得祸。书而为词兮,愿寤来者。’

柳宗元对不法药商毫不留情地给予曝光,就是在反思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,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再上当。只有都较真起来,对假药人人喊打,才能使之畏惧,从而彻底消灭假药坑人这一顽疾。

正因为柳宗元有了这样的经历,所以他对于那些诚信经营的医生、药店特别推崇。宋清是长安一家药肆的老板,因诚信经营而出名。他在药店储藏的都是好药材,许多药农感于宋清的为人,采来并制好中药材,一定要送到宋清的药肆,宋清也不亏待这些药农,都按高价收购。同样,长安的医生也喜欢用宋清药肆的药来配药方,因为治病效果好。

平时,宋清总是很热情地接待每一位客人,有的病人缺钱或是忘了带钱,宋清也会把药先赊给他们,为此宋清家里积攒了很多欠条,他从来没有上门去索取药钱。有些素不相识、从外地来的人,他照样给打欠条。每到年末,宋清估计有些人的账是没法还上了,就把其欠条烧掉。其他的商人对宋清的举动很费解,嘲讽他“是个蠢人”,当然也有人认为:“宋清大概是那种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吧!”宋清听过这些议论,坦然地说:“我经商赚钱养活妻子儿女,道德高尚还谈不上,但要说我是蠢人,也是不对的。”

就这样,宋清在长安卖药四十年,先后有一百多人的欠条被烧掉,其中有后来做大官的,有管辖郡县的,他们派人给宋清送钱

送物,接踵而来,宋清家门槛快被踏破了。赊欠宋清药钱至死没还的约有千人,但宋清最终照样成了一个富翁。史载,唐贞观年间名将尉迟敬德,也曾在宋清药肆买过药,可见宋清的药肆在长安影响之广。

对于宋清不卖假药、救济贫困的做法,柳宗元深有体会,所以他很是感慨:“清居市不为市之道,然而居朝廷、居官府、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,反争为之不已,悲夫!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。”尽管后来柳宗元从京城被贬到几千里外的永州,仍然念念不忘京城这位叫宋清的模范药商,专门为他写了传记《宋清传》,以弘扬宋清这种优良作风。

宋清的事迹在唐代一些史书也有记载,可见不是柳宗元杜撰。据《唐国史补》载:“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,朝官出入移贬,清辄卖药迎送之;贫士请药,常多折券,人有急难,倾财救之。岁计所入,利亦百倍。长安言:人有义声,卖药宋清。”

像宋清一样的药行、药肆、药市,在长安大都分布在东、西两市。当时的诗人张籍曾在长安生病,亦有治病买药的经历,对一些药商坐地起价的行为很是憎恨,就曾写过《赠任道人》诗:“长安多病无生计,药铺医人乱索钱。欲得定知身上事,凭君为算小行年。”

长安东西市包括药肆在内的商家很多,据日本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记载,会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,“夜三更,(长安)东市失火,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,官私钱物、金银绢药等总烧尽”。这次被火烧掉的药行、药肆的药材有很多,所以药商损失很大。同时圆仁还提到唐皇帝曾安排人到东西市寻觅合适的药材,可见药行、药肆是经政府承认的,是合法的商品经营场所。

当时长安药肆经营的药材品种不少,有的药肆经营熟药,即中成药,在西市就有卖饮子的药家。在《太平广记·田令孜》中记载了卖中成药饮子的情况:“长安完盛日,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,用寻常之药,不过数味,亦不闲方脉……常于宽宅中,置大锅镬,日夜剉研煎煮,给之不暇。人无远近,皆来取之,门市骈罗,喧阗京国。至有赍金守门,五七日间,未获给付者,获利甚极。”除了熟药,有的药肆还经营生药,白居易诗歌中“长安药肆黄蓍贱”中的黄蓍即是一种生药。

长安药肆的药材采购途径,从资料记载来看,主要有两种:一是来自专门种植药材的药农,以及《宋清传》中所说的“有自山泽来者”,即从山川河湖采摘中草药。第二种途径就是进口药材。据《唐大和尚东征传》一书记载,八世纪中期广州进口外国药材的盛况空前,“江中有婆罗门、波斯、昆仑等舶,不知其数,并载香药、珍宝,积载如山。”这些从广州进口的珍稀药材沿途贩运,一直运送到京城长安的药肆。

正是有了宋清这样的药肆,以及中草药材来源渠道的保证,长安居民就医买药的需求才得以保证,得到柳宗元这样大文学家的表扬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同样也要为柳宗元批评不法药商的做法叫好,在治理医药问题、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方面,舆论监督自古就不曾缺席。

□刘俏到

明朝嘉靖三十八年正月,34岁的王世贞自青州北上台谒,至历城拜访毕生挚友李攀龙。此时王世贞自刑部外放山东近三年,李攀龙辞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、隐居白雪楼逾两年。王世贞后来谈到,自己的到访让李攀龙万分欣喜,家境贫薄的他特地“烹一豚”“出蟹胥佐醡苦”。两人坐而论诗、长饮终夜,“尽一醡苦、五十六螯”,想来应是相当尽兴。

李攀龙,字于鳞,号沧溟居士,济南府历城人。王世贞,字元美,号凤洲,苏州府太仓州人。两位刑部同僚于十多年前订交,彼时李攀龙遥追“前七子”之首李梦阳,“诗文诸体皆追溯古源”,王世贞与之颇有关联。两人遂与刑部诸士结社共盟、交游赋诗,成为明代中叶文坛“后七子”领袖。

真文人往往有个性。“后七子”一旦结盟,其力倡古文辞而不拘流俗的张扬姿态,迅速招来种种非议。又值严嵩当政,王世贞与刑部诸士绝不依附权臣,还在著名的“杨继盛案”中施援善后,这些都被严党看在眼里、恨在心里。因此,李攀龙等“后七子”被陆续安排出京任职。

李攀龙先是外放河北顺德,三年后去陕西就职。当时陕西巡抚是山东人殷学,两人一个挟势倨傲、一个恃才自傲。殷巡抚听说李攀龙文章写得好,于是“下檄于鳞,代撰奠章及送行序”。

“檄”是下行文书,李攀龙视为侮辱,“文可檄致邪”?意思是文章可写,但不能命令我写。而殷巡抚仍然坚持要摆领导的谱,李攀龙就说:“彼岂以我重乞官耶”——我才不稀罕当这官呢,立刻辞官归故里,连吏部的批复都不再等。

李攀龙辞官前,王世贞曾加以劝阻。但对李攀龙来说,辞官是他更高精神追求的开始,决心不可更改。不过,他在王世贞建议下,于历城王舍人庄东北隅营建了鲍山南楼,后称白雪楼。从此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,“海内学士大夫,无不知名于沧溟先生”,而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王世贞的来访,自是相当重要的一次。

只不过,潜藏在这新年喜庆之下的暗流,却是帝国朝政的尖锐斗争。“杨继盛案”以来,严嵩一党与反严势力水火不容。李攀龙白雪楼夜谈四个月后,王世贞之父王忬因战事失利,受严党构陷落狱,多年来王氏家族与严党结怨的矛盾全面爆发。次年十月王忬遇难,王世贞遭遇人生大劫,携弟扶丧南归。经运河路过济宁时正值寒冬,李攀龙自白雪楼单骑长驱四百里,吊唁挚友父丧,“真凛凛有古人之壮节”。须知王忬死难前后,诸士多避而远之,唯恐被严党惦记。

王世贞回到老家太仓,先为父居丧二十七个月。他自认“天地大罪人”,基本息绝交游,独与李攀龙等至交好友保持书信往来。三年后他脱下孝服,慢慢与周边及各地慕名而来的文士交往频繁,恢复和织密自己的朋友圈,延续当年刑部“后七子”结盟、独树文坛一帜的声望,也

正好以诗酒“畅怫郁、浇磊块”。

当年王世贞在青州任职,曾与群贤戏言“愿得二顷水塘,作园居隐”,如今他有了机会。父丧除服之后,嘉靖四十五年秋,他购得太仓隆福寺西侧一片土地,开始打造一个安静的私园,后名弇山园。随后二十年里,他的私园不断拓建,终成七十多亩的泉石花竹之盛,与更晚建成的沪上豫园比肩东南。

王世贞南方筑园之时,李攀龙又在大明湖南岸百花洲筑楼,这就是四面环水的“湖上白雪楼”,往来之客只能舟渡入门。白雪楼本指阳春白雪之楼,当然只接待阳春白雪之士。清人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记载,楼前若有俗客临门,李攀龙会高卧不出;若有文士到来,则“先请投其所作诗文,许可,方以小舟渡之”,看不上的就称“亟归读书,不烦枉驾也”。

就在这一年,嘉靖皇帝驾崩,朝野形势骤然变化。此时严党早已倾覆,一批忠臣志士回到前台。隆庆元年十月,李攀龙走出白雪楼赴任浙江按察副使,十二月途经苏州时,与王世贞相聚。多年风波过后,如今感慨无限,按李攀龙说法是与王世贞兄弟“雄饮姑苏三日夜”。

复出三年后,58岁的李攀龙因病逝世。李攀龙在世之时,达官显贵以其接见为荣,学人士子以其品评自嘉,因此“闻望茂著”“操海内外文柄垂二十年”。李攀龙离世后,王世贞接过文学复古大旗,“巍然崛起东海之上”,继为一代文史大家。此时弇山园已初具规模,成为白楼之后又一文人雅士聚集之地。不过,与李攀龙高姿态略有不同,晚年的王世贞变得恬淡随俗,声称“当与人共之”,得与同游于私园。

后,王世贞接过了文学复古大旗,“巍然崛起东海之上”,继为一代文史大家。此时弇山园已初具规模,成为白楼之后又一文人雅士聚集之地。不过,与李攀龙高姿态略有不同,晚年的王世贞变得恬淡随俗,声称“当与人共之”,得与同游于私园。也是这种心态,让更多的普通文士得到了他的扶持庇护。

回想当年白雪楼的李王夜谈,其主要内容当然不在叙旧,而是推心置腹的“评榷”文学。自京师结盟以来,两人终有机会以更加理性的心境共同反思十多年来结盟复古的得失、探讨今后文盟的延续。那次并不起眼的夜谈,毫无疑问对随后两人及明代中叶的文坛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王世贞对李攀龙的文学观点未必全盘认同,但对其人一生尊崇。李攀龙离世后,王世贞先在隆庆年间将其诗文会集三十卷、刻印行世,又在万历年间点校遴选、重新刊行,作为对至交好友不可忘却的纪念。晚年王世贞还多次为李攀龙写下感怀诗文,委托北上的同乡过访其家,更对李攀龙的后代和门人关照有加。有一年,王世贞于弇山园作文以祭李攀龙,文中告以身后事及同道诸士、家人近况,并以“专至且鲜,兼工独汝”八字为其盖棺论定。

从白雪楼到弇山园,在古代文人营楼造园的雅兴里,见证着明代中期文学复古的一段小历史,更得以窥见李王二士志同道合、绵延毕生的真挚友情。

【人文地理】

从白雪楼到弇山园

